



一二九运动回忆录

一二九运动回忆录

第一集

一二九运动回忆录

第一集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276,000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700

书号 11001·474 定价 1.00元

出版说明

一九三五年，在祖国和民族面临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吹响了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号角，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一二九”运动在我党历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同时也是我党领导下的青年学生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

为了搜集、积累、保存“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资料，我们特邀请了当年亲身领导和参加这一运动的老同志撰写回忆录，并收集已发表的回忆录，汇编成《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供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参考。同时，本书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同志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也是一本很好的读物。

《一二九运动回忆录》，是以个人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从不同侧面或片断来追忆记述这一伟大的战斗历程，囿于记忆，难免会出现与某些史实有出入或互不一致之点，这当有待于继续研究和补充订正。

我们力求将“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录收集较为齐全，陆续汇编出版。我们热忱盼望全国各地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抽暇撰写，寄给本社。

谨向撰写“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谢忱。

本书曾得到陈翰伯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具体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杨树先、唐纪明、许克清、王冬琳同志。

一九八一年五月

目 录

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来潮	宋 黎 (1)
——回忆“一二九”运动	
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	郭明秋 (58)
我对“一二九”运动的回顾	何 礼 (70)
巨浪, 巨浪, 不断地增长!	陈翰伯 (93)
——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	
回忆“一二九”运动	
..... 韩天石、孙思白、刘玉柱、张震寰、谢云晖、	
黄 华、袁宝华、陆 平、朱穆之、蒋南翔	(131)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	陈其五 (160)
“一二九”时期的北师大片断	于 刚 (172)
“一二九”运动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黄秋耘 (200)
“一二九”运动的点滴回忆	张申府 (211)
“一二九”的片断回忆	许德珩 (215)
“一二九”运动中的《燕大周刊》	赵荣声 (221)
清华静斋见闻.....	郭 建、黄 葳、吴 瀚、张自清、王作民 (232)
——忆“一二九”	
一场激烈的斗争和一个真实的故事	胡开明 (247)
“一二九”运动中与国民党当局斗争的片断	黄绍湘 (255)
——回忆华北学生献旗团赴南京请愿经过	

一九三五年至抗战爆发前后党领导下的

- 天津学生救国运动李启华 (269)
- 参加天津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回忆王绶昌 (280)
- 回忆“一二九”运动中天津妇女救亡工作
.....陈晶、安琳 (293)
- 回忆天津“一二九”学生运动朱光 (302)
- 记“一二九”运动赴南京请愿的经过王刚 (307)
- 回忆“一二九”天津学生运动片断于瑞英 (313)
-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通俗剧团黄沙 (319)
- 忆“一二九”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和南京学联李庚 (325)
- “一二九”运动中复旦大学的学生运动史亚璋 (348)
- 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彭瑞复 (354)
- “一二九”运动中的上海中学联陈明 (358)
- “一二九”运动中的上海学生运动片断胡实声 (362)
- 往事重温魏璐时 (366)
- “一二九”运动前后在武汉李锐 (377)
- 留在我心中的一颗火种高维进 (407)
- 回忆开封学生卧轨请愿的前前后后
- “一二九”运动前后华南的爱国群众运动连贯 (415)

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来潮

——回忆“一二九”运动

宋 黎

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转眼已经过去四十多个春秋了。一些出版单位约我写篇记述当年斗争情景的文章，这引起了我对往事深切的回忆。

一九七九年，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王福时同志寄给我一本《读书》杂志，其中有篇《谈〈西行漫记〉及其他》的文章，作者是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她写道：“……我记得在西安事变前有许多东北人到过我家，他们当时（指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和焦虑……东北大学学生运动的带头人宋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十二月九日，宋黎在街上领着游行的队伍。他同王汝梅（即黄华）、俞大卫（应为俞启威，即黄敬）、姚依林和其他人一起，是主要领袖之一。”她的这段话，对我个人有些过奖，我只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做了些我应该做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一二九”运动前后我们的心境和当时斗争的情景。

震惊中外的“一二九”

“一二九”运动的前夕，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

关头。蒋介石卖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奉行“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东北人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蓄谋吞并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又把魔爪伸向热河、察哈尔和关内。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塘沽协定”，承认了日寇占领东北“合法化”，使华北门户洞开，日军随时可以直取平津。一九三五年，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华北的统治权。高喊“先安内，后攘外”的蒋介石卖国政府，在“五二九”河北事件后，又于六月跟日寇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把国民党军警宪特一律按日寇要求撤出平津，取缔全国一切抗日团体及活动；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党部；撤出了包括宪兵三团在内的国民党在河北的驻军，葬送了河北；接着又签订了《秦土协定》，将察哈尔的主权拱手送给日寇。这样，使日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完全控制了华北。十月，日寇在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领县城，组织“县政临时维持会”，接着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吞并华北。为了适应日本侵华的需要，汉奸们哄然应和。十一月，殷汝耕抢先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十二月，蒋介石指使宋哲元筹备“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沦亡危在旦夕！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日寇汉奸们弹冠相庆，耀武扬威；广大爱国人民怒形于色，奋起反抗；奴颜媚骨的蒋介石卖国政府则下了臭名昭著的“敦睦邻邦”的命令，对抗日的人民暴力镇压，血腥屠杀。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境地的北平，一片白色恐怖。荷枪实弹的日军在街上横行无忌，日本浪人胡作非为。铁路沿线经常发现被杀害的中国工人的尸体，爱国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不断受到迫害，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同学们深

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们东北青年，饱尝国破家亡的苦难，抗日救亡的呼声更加高昂。

我在一九二八年因组织反日活动被辽宁省西丰县立中学开除，一九二九年考入东北大学预科。入学后不久，爱国教师车向忱和爱国学生张希尧、张金辉、戴昊、王栖忱等组织了“国民常识促进会”，我也是组织者之一。我们积极进行反日宣传，开展了反对贩卖毒品、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活动，并向东北军第七旅（王以哲旅）官兵进行反日宣传。“九一八”事变后，我们东北大学的学生不甘心当亡国奴，背井离乡流亡到北平，在那里复了校。当时中国共产党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及时发出号召：“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不久，我们一些同学先后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进行武装抗日活动。一九三三年，东大同学郭明德、江涛被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逮捕。郭明德同志在受刑时英勇牺牲，江涛同志在日寇的监狱里服了五年苦刑。一九三四年，义勇军失败，张金辉和我撤回北平，在东北大学复了学。那时我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复学后担任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四年前后，以蒋孝先为团长的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镇压人民革命极为残酷，严禁一切抗日活动，连高崇民、阎宝航同志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牌子都被摘掉了，抗日活动全部转入地下。一九三四年夏秋间，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但是分散在北平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都在积极地进行抗日活动。

后来听说，当时河北省委指定北平共青团市委代行市委的领导工作，组成了临时北平市委。一九三五年秋，黄河决口，山东、河北遭受大水灾，无数灾民饥寒交迫，拖儿带女，沿路乞讨，流落北平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急需救济。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见死不救。这时我党为解救灾民的疾苦，团结和教育青年，在学生中发起了黄河水灾赈济运动。北平的大中学校组成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演戏、义卖等活动，为灾区募款、募实物，然后由学生派代表到灾区去慰问。参加东北大学水灾赈济会的有王振乾、杨旭、张金辉、郑洪轩、董学礼、戴昊和我等十几个同学。东大派往灾区的代表王振乾、杨旭同学，直到“一二九”运动开始，尚在灾区没有回来。通过这次水灾赈济活动，党组织广泛地团结了群众，为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为了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党通过在巴黎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报》，把“宣言”邮寄给国内各阶层人士。有的同学从北京饭店楼下的法文图书馆发现了“八一宣言”，如获至宝，回校后，在同学中广为传播：“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而实际沦亡了！”“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的思想，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响应；建立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目的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深入人心。它不仅使同学们进一步认识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也从“宣言”中找到了抗日救

国的出路。一九三五年十月，我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开赴抗日前线，十一月我党又两次发表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挽救民族危机。抗日救亡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为了更好地领导学生抗日救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北平市学联正式成立。郭明秋任学联执行主席。学联党的领导有彭涛、姚依林、黄敬等同志。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市学联成立不到一个月，便率领爱国学生冲上了抗日的战场。十二月三日，北平学联召开会议，决定联络北平各大中学校，向华北最高当局发起大规模请愿，同步步进逼的日寇和卑躬屈膝的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十二月八日，学联又召开了各校代表大会，确定于十二月九日上午十时前在天安门广场集合，然后去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何应钦请愿，陈述人民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的要求。学联还为各校请愿队伍准备了大量宣传品。东北大学参加市学联会议的两位代表郑洪轩、邹素寒回到学校后，于八日晚在俄三班宿舍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向我和关山复等十几个同学传达了请愿的决定。大家听后十分兴奋，立即分头发动群众。爱国的同学们都以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忙碌起来，组成了宣传队、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写标语、印传单、做旗帜，这天晚上许多同学通宵未眠，为游行做准备工作。

十二月九日这天，阴云密布，朔风凛冽，是个滴水成冰的日子。清晨，当这座文化古城还在沉睡的时候，东北大学已经沸腾了！突然有同学报告：“学校被军警包围了！”我们不顾军警的威胁和学校当局的阻挠，在大礼堂召开了东北大学全体

学生大会，传达了市学联关于和平请愿的决定。同学们群情振奋，一致拥护。当场选举我做东北大学请愿队伍的总指挥，我向同学们作了简短动员：东北沦亡，多少同胞无家可归，目前华北垂危，我们已无法安心读书，当务之急是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抗日！……

打回老家去，消灭日本侵略者是东北学生共同的强烈愿望。这些失掉了家乡、远离亲人、饱尝亡国奴之苦的东北青年们，再也不能坐视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被日寇鲸吞了！我们立即带领斗志昂扬、视死如归的同学们冲出了校门。

这时，燕京大学的交通员跑来报告：“进城的路上有密集的军警堵截，清华和燕京的汽车被扣了，现在同学们正徒步赶来，可能迟一点，请东大同学等一等。”紧接着又一位交通员骑车来报告：“西直门关了，同学们进不来了！”原定清华、燕京由这一路进城，跟西直门里的东北大学汇合，现在相隔非遥，却无法聚合，我们只好孤军出动了。有些教职员工也参加了请愿，如学校图书馆的职员郝克勇和军训处教官李仕廉、戴昊等都参加了游行队伍。我们四个人一排，手挽着手，女同学在队伍中间，潮水般地涌向街头。

新街口一带，军警已布置了一条封锁线，为了避开军警，我们的队伍从北沟沿转到西四北大街。迎面传来欢呼声，有二三十名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同学来参加游行了！法学院被军警包围，校门上了锁，他们是跳过围墙跑出来的。当我们走到西四牌楼前，二、三百名武装军警横拦着，堵住了去路。同学们怒气冲天，紧挽手臂，迎着耀武扬威的军警，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张牙舞爪的军警，挥起棍棒，抡起大刀，向同学们

袭击。这时，王敬桓同学被军警打倒在地，接着又有刘淑清、唐静淑、侯淑彦等几名女同学被打伤。关山复同学发现军警去抓王敬桓时，立即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石灰包向军警脸上打去，他们迷了眼睛，这才撒开手。临危不惧的同学们怒吼着：“向前冲啊！”猛狮般地冲破了封锁线，雄赳赳地从府右街向新华门进发。

东北中山中学也遭到了军警的阻截。郭峰、李涛、甘仲斗、高铁等许多同学机智地冲出了包围圈。他们不惧武力威胁，在途中奋力与军警抢夺水龙，终于战胜了色厉内荏的武装军警，同我们胜利会师在新华门前。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军警几乎包围了准备参加请愿的所有学校。东大和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都是流亡子弟，他们抗日复土还乡的斗争精神顽强，集体冲出了军警的封锁线。被军警包围的其他学校的一些同学，经过艰苦斗争，克服重重困难，也三五成群地赶到集合地点。陆续汇集到新华门前的请愿队伍约两千多人。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大门，国民党华北最高当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就在中南海里面的居仁堂“办公”。几天前，被日寇雇佣的汉奸、地痞流氓组成的“华北民众自治会”五百多人，声嘶力竭地喊着“中日提携”、“华北自治”、“共同防共”等反动口号向何应钦“请愿”、何应钦笑脸相迎，待若上宾。今天，面对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他却如临大敌。新华门紧闭着，前廊排列着手持刀枪的武装军警，摩托车上架着机枪，真是杀气腾腾！这种鲜明的对比，更激起了同学们无比义愤，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枪口对外，齐步向前！……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雄壮的歌声刚落，又响起了激昂的口号声：

“反对华北自治！”
“收复东北失地！”
“反对内战，一致抗日！”
“打倒汉奸卖国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是全国人民的心声！北平学生不顾反动政府的迫害，第一次发出了民族的怒吼！当我们冲破了“爱国有罪”、“抗日犯法”的铁网，满腔悲愤地第一次在大街上喊出这些爱国口号时，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各校推举代表到居仁堂请愿，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防共自治运动”，要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代表人民意愿的六项要求。诡计多端的何应钦不肯接见，早已避居别处，学生们在广场上等了一、两个小时，何的参谋长才失魂落魄地出来说：何代委员长不在北平，代表们提的要求

可以转达。他要学生们“谅解”政府的困难，好好地“读书救国”。同学们要他下令打开西直门，让清华、燕京等校的同学进城参加请愿，他却支支吾吾地予以拒绝。

请愿不成，为了表达人民的抗日愿望，我代表东北大学与其他学校代表紧急商量，当机立断，决定改为游行示威。由于东北大学参加的人数最多，整个游行队伍的总指挥便由东北大学担任了。我招呼同学们把队伍整顿好，宣布：“游行示威开始！”顷刻，高昂的口号声、歌声直冲云霄。我们考虑到许多学校被围，学生队伍没有完全拉出来的情况，为了集结同学、壮大队伍，宣传群众、扩大影响，决定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沿着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沙滩、王府井大街，然后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大学、弘达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志诚中学、成城中学、镜湖中学、汇文中学、艺文中学、河北高中、十七中学、孔德中学、竞存中学、精业中学等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有的学校冲出来的人员少，没有校旗，临时到商店买布，做成旗帜，以便三五成群的同学集合在本校的旗帜下参加游行。每经过一个学校，都有同学加入，整个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我们组织了宣传队伍，不断向沿街的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沿途两侧的工人、教师、家庭主妇和商人不断鼓掌喝彩，表示支持，很多人争抢着阅读游行队伍散发的传单。奉命前来阻挠学生游行的警察和保安队员中，有一些人也被学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学生给他们塞传单，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们常常窘迫地苦笑着。有些进步的中外记者，如刘尊棋、斯诺、尼姆·威尔斯等，

自始至终跟随着我们的游行示威队伍，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我们这支队伍，象决了口的黄河大水，浪涛滚滚，奔腾倾泻，几次突破军警的封锁线锐气不减。朔风吹不冷我们的热情，刺刀吓不退我们的勇气，同学们冒着严寒，饿着肚子，在冰天雪地里斗志昂扬地从清晨游行到下午。

当我们的队伍来到辅仁大学时，由于事先派出交通员与该校同学联系，刘达等许多同学踊跃地加入了游行队伍。接着来到了“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那天，虽然北大有同学参加了游行，但事先全校没有总动员。我们的宣传员到校内高喊：“北大，起来！”“北大，恢复‘五四’精神！”随后到达的大队人马则在校门外遥相呼应。这震撼人心的呼声，象火种点燃了山头的野火，顷刻间燃遍了全校。各教室、试验室、图书馆的门都打开了，同学们奔走相告，纷纷集合在校门前，以战斗的姿态加入到游行行列。附近的中法大学和两吉女中也赶来参加了。我们这支已壮大到六、七千人的铁流，又浩浩荡荡地前进了。我们计划转进到王府井大街，然后到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这时前面的纠察队传来了消息：东交民巷一带有大批日本兵出动，沿街架起了机枪。反动政府此刻已吓得懵头转向，以为我们要去东交民巷领事馆区冲击日本大使馆，气急败坏地调来大批军警部队，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救火车横列在街口做防御工事，两旁人行道上站满了军警，手持水龙、大刀、木棍等凶器，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游行队伍的到来。

同学们怒不可遏，面对在日寇面前其软如棉，在人民面前